

古代冀南中心城市的两次转移探微

王云江¹, 赵悦², 祁萌²

(1. 河北工程大学 学报编辑部, 河北 邯郸 056038;

2.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河北南部一带在中国古代曾先后崛起邯郸、邺城、大名等重要城市, 这些城市在各自时代都发展为地区乃至北方中心城市。在东汉末年和北周末年两个时期, 冀南中心城市先后发生了由邯郸到邺城、由邺城到大名的转移。中国一乱一治的宏观历史环境, 冀南特殊的地理状况, 以及水陆交通条件的变化等构成了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邯郸; 邺城; 大名; 中心城市

[中图分类号] K23; K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2)03-0051-05

华北平原地处我国古代农耕文明核心区域, 这里的冀南地区更是历史悠久的文明故地。在中国古代史上, 冀南先后崛起邯郸、邺城、大名等重要城市, 又随之衰落。本文拟从冀南地区历史演变的脉络出发, 对古代冀南中心城市的两次转移略作探讨。

一、古代冀南中心城市的两次转移

冀南中心城市的第一次转移发生在东汉末年, 由邯郸到邺城。

邯郸大约出现在商代, 目前分别据甲骨卜辞和《竹书纪年》有武丁、商纣二说。自“祖乙迁于邢”^{[1]卷3《殷本纪》: 100}开始, 冀南一直处于“畿内地”, 邯郸借此不断发展。东周时, 邯郸“本卫邑, 后属晋, 入战国属赵”^{[2]卷2《疆域志》: 148}。春秋后期, 经过宗室内部激烈的争夺, 邯郸在前492年前后成为赵氏宗族赵简子的领地。前386年, 赵敬侯迁都, “赵始都邯郸”^{[1]卷43《赵世家》: 1798}, 从此至赵亡于秦, 是邯郸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战国时的邯郸, 人口众多, 工商业发达, 尤以冶铁为最, 因而成为冀南乃至华北的中心城市。

秦汉时代, 邯郸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秦破邯郸后, 置邯郸郡于此。秦末战争中, 秦军击败赵地起义军后, 其将“章邯引兵至邯郸, 皆徙其民河内, 夷其城郭”^{[1]卷89《张耳陈馥列传》: 2578}, 这就造成了对邯郸的一次重大破坏。需要指出的是, 此时的邯郸主要是沿用战国旧址, 即主要有五座城址, 章邯的破坏主要是针对赵王城, 而不是彻底将邯郸夷为平地。后来西汉重建邯郸城, 基本上就是以旧城为框架的。《史记·货殖列传》说西汉城市有五都之说, “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1]卷129《货殖列传》: 3264}, 仅次于长安和洛阳。但是“东汉中期以后都市经济萧条, 人口递减, 都市面积也随之缩小……都市中部西侧

的居民区早已荒废……”^[3]。

在邯郸兴盛的同时, 邺城也处在缓慢发展之中。《管子·小匡》载“(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兴、杜丘以卫诸夏之地”^{[4]卷8《小匡》}, 其中邺既是邺城。前439年, 魏文侯得邺地, 此后“西门豹引漳水以溉邺城”^{[1]卷29《河渠书》: 1408}, 使其获得初步发展。战国时期, 又有“史起为邺令, 遂引漳水溉邺, 以富魏之河内”^{[5]卷9《沟洫志》: 1677}。但是在邯郸的光环之下, 邺城一直难以获得更大的发展, 长期作为军事据点和县级治所存在。至东汉末年, 邺城“州城粗定”^{[6]卷6《袁绍传》: 194}, 始成为冀州州治。

东汉末年, 诸侯纷争, 战乱四起, 华北地区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邯郸此时已经大不如前。袁绍占据邺城后曾认为“吾南据河, 北阻燕、代, 兼夷狄之众, 可以南向以争天下”^{[6]卷1《武帝纪》: 26}。这样冀南政治军事中心开始由邯郸向邺城移动。曹操夺取邺城以后, 亦据此为统治中心, 邺城成为东汉王朝实际上的首都。据《历代宅京记》记载, 曹操大肆营建邺城:

汉建安十三年春正月, 作玄武池以肄舟师。

十五年冬, 作铜雀台。

十八年秋九月, 作金虎台, 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

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邺城南, 又曰, 建安十八年七月, 始建宗庙于邺^{[7]卷11《邺上》: 166}。

由此, 邺城在城市建设尤其是水运交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台、玄武池的修建进一步优化了邺城的军事条件, 运河的开通使冀南农业得以较快恢复的同时形成了以邺城为中心的水运网络, 冀南经济中心也转移到了邺城。相比之下, 邯郸则变得默默无闻, 中世史料上鲜见其名。“总之, 邺城一旦兴起, 相距很近的邯郸就很难再恢复它过去在政治上

的重要性了”^{[8]327}。可以说曹操时代完成了冀南中心城市的第一次转移。

此后,邯郸一直处在衰落之中,城池虽一直存在,但规模很小,人口稀少,“‘大汉城’……显然已经失去了原有城市功能,有的地方甚至已经能成为埋葬死者的荒郊墓地”^[9]。邺城则不断向前发展。整个魏晋南北朝,北方处于空前的混乱之中,“(洛阳)久为边邑,城阙萧条,野无烟火”^{[10]卷31《于栗磾传》:736},“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11]卷5《孝惠帝纪》:132},邺城则经久不衰,成为魏晋南北朝史上举足轻重的北方中心城市。

西晋末年以后,邺城重要的军事地位再次体现出来,先后成为后赵、前燕首都,及十六国后期前秦、后燕势力的主要据点。北魏击溃慕容集团后,将邺城纳入版图,并以此为其进入中原的跳板。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朝野屡有迁邺之议,而北魏分裂后,东魏政权终于在高欢的威逼下迁都邺城。史载高欢“以十万夫撤洛阳宫,运于邺……增筑南城”^{[12]卷54《高隆之列传》:1945},修建邺南城时又“掘得神龟大逾方丈,具堵堞之状,城似龟象焉”^{[13]卷4《古籍志》:10},可见高欢营建邺南城,不只将其视为政治军事据点,更有意使其成为堪比汉代长安洛阳的华夏名都,邺城因此在东魏、北齐进入了鼎盛期,酈道元言“此城凡诸宫殿门台隅矩,皆加观榭。层甍及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里,远望台亭,巍若仙履”^{[14]卷10《浊漳水》}。

第二次转移开始于北周末年。

北周灭亡北齐后,在邺城设置了总管,统领相州地区。公元580年,相州总管尉迟迥据邺城反叛。韦孝宽平叛后,“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皆毁废之”^{[15]卷8《静帝纪》:133},本来繁荣的邺城在一瞬间消失。

邺城毁灭后,冀南地区一度没有中心城市,大名的兴盛则要推后至7世纪初。《大名县志·河渠志》言“大业中,引白沟为永济渠名曰御河”^{[16]卷7《河渠志》:294}。白沟即今天的卫河,从大名故城城东流过。也就是说,永济渠当时就在大名城东城墙下。凭借大运河提供的交通条件,大名飞速发展,经过初唐、盛唐的积累,大名已经成为大运河中段枢纽,华北经济重镇。中唐以后唐朝陷入藩镇割据的泥潭,“唐肃宗广德元年置魏博等州防御使……治魏州,是年升为节度使”^{[17]卷66《方镇表三》:1840},魏博镇范围就是今天冀南一代,大致下辖贝、博、卫、相、磁、洺七州,治所魏州城就是大名。方镇问题,河北尤甚,河朔三镇,魏博为首,这样大名凭借方镇的设立和

发展进一步成为河北政治军事中心。再到后唐,李存勖在大名即位,并“诏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18]卷29《庄宗纪》:404}。至此,大名第一次成为首都,此后虽然唐迁都洛阳,但五代各朝均以大名为陪都,大名完全建立起自己冀南乃至整个北方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地位,完成了中心城市的又一次转移,所谓“邺都^①富盛,国家藩屏”^{[19]卷282《后晋纪三》:9224}。

就影响来看,由于邺城被毁严重,加之大名的崛起占据了水运条件,邺城未能如邯郸一样存有一线生机,而是彻底化为废墟。出于抵抗辽国的目的,宋仁宗庆历二年“建大名府为北京”^{[20]卷11《宗纪三》:214},大名再次成为陪都。大名虽为抗辽前线城市,但宋、辽相对和平的局面使大名具有军事功能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都市的繁荣。寇准言“东都股肱今右府,北门锁钥古天雄”,《宋史》又说“天下一统地理,独以肥乡首列”。时称大名“占尽天下风流”,可以说作为北宋陪都的七十年,是大名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

北宋以后,大名逐渐衰落,伪齐时代一度成为首都,金、元都是普通州县。这一期间,大运河的改道和漳、卫等河的水患加速了大名的衰落。《大名县志·建置志·城池》言:“明洪武三十四年(即建文三年)旧城圯于水”^{[16]卷6《建置志》:209}。至此大名城废,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古代冀南中心城市转移的原因

就第一次转移来看,原因有二:

第一,邺城更好的军事条件吸引统治集团选择邺城,导致邯郸衰落。邯郸兴起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诸侯兼并,被邺城取代却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战乱中。魏晋南北朝时代不同于战国,由于冀南往往不是一国的腹里地区,反而多次成为几方势力交战的前沿,甚至一个孤立的点,因而对冀南城市军事条件的要求发生了改变——先前是一座条件较好的城市作为区域中心,调动整个区域的资源支持城市,现在则要突出强调城市本身具体的军事条件。《水经注》载邺南今河南延津到浚县河段上有灵昌、石济、延寿、黎阳四镇,均是黄河上的军事要塞;晋人郭像生《述记征》记录太行八陉说“第四溢阳陉,对邺西”,可见邺城控制黄河和太行山的条件明显好于邯郸,也就能更有力地控制河南、山西。同时“邺城更接近中原,便于以河北为根本而争霸中原”^{[8]327},故而

注释:①此处的邺都并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邺城,而是指大名,由于历史积习而有此种称谓。

袁、曹等集团都选择了邺城。战争环境中资源匮乏，也就加剧了城市的分化，邯郸因此被邺城挤垮。这是外部政治环境作用于冀南地理条件的结果，这是冀南中心城市第一次转移的地理原因和政治原因。

第二，冀南水运网络的营建使水运交通开始取代陆路交通，突出了邺城的地位，进一步削弱邯郸本已经衰弱的实力。邯郸经济在东汉中期开始衰落，在东汉末年，由于北方经济大环境的破坏，邯郸的商业受到严重打击，城市失去了经济动力。另一方面，邯郸原是太行山山前南北大道的重要枢纽，“由于平原水道的发展，邺城在交通地位上就超越了邯郸”^{[8]327}，不论是出于军事考虑还是经济动因，运河的开通确实使社会财富更多地向邺城聚拢，也就使邺城又取得了经济优势。正是邯郸经济长期的不景气 and 交通条件的变化，构成了中心城市由邯郸向邺城转移的经济和交通原因。

就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战乱环境是明显作用于历史的直接动因，二城在经济和交通领域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则是深层原因。

就第二次转移而言，原因有三：

第一，战争环境的再次出现突出了冀南的优越地理条件。从邺城毁灭到大名进入兴盛期，冀南地区暂时没有辐射面积超出本地区的政治中心。类似的情况曾经出现在邯郸早期历史上。从地理条件看，冀南“唇齿泽潞，臂指邢洛，联络河洛，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21]卷49《河南四》：2316}，“盖驰逐中原，邺馆穀之口矣”^{[21]卷49《河南四》：2316}，即是说冀南城市地理上的优势在战乱之时最能得到体现，而冀南之所以暂时没有出现政治地位崇高的城市也与盛唐前的和平环境有关。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从中唐、五代开始，大名的政治地位上升。因此可以说，战乱环境的再次出现，是冀南中心城市再度完成转移的政治军事原因。同第一次转移一样，地理环境是外部条件发生作用所凭借的内部因素。

第二，大运河的修建使大名凭借水运崛起，进一步削弱了陆路交通的作用，既杜绝了邺城凭借水运复兴的可能，又消除了邺城控制山河要点的优势。邺城毁灭后，附近的水利设施也因为失修而被破坏，大名借助邺城被毁的历史机遇，凭借冀南良好的自然条件成为大运河枢纽，而大名的兴起已经满足了这一地区对交通枢纽的需要，因而杜绝了邺城再次凭借水运崛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侯仁之先生指出“（大运河的开通）进一步削弱了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的重要地位”^{[8]328}，邺城以西太行山上的军事要点是通过陆路连接的，大道地位的下降，也就使

得这些关隘的重要性下降，同时由于大运河的开通，邺南依托黄河渡口的几个军事要塞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由此可以说，由于时间间隔的特殊原因，二城对水运条件的竞争变相表现为大名对邺城水运条件的继承，但就本质而言，最终由于水运条件的转移和交通体系整体上的重大变化，邺城被大名取代，这是中心城市第二次转移的交通原因。

第三，邺城在和平时代曾表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这是中心城市又一次转移的内在因素。曹丕接受东汉禅位后，次月即“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6]卷2《文帝纪》：76}。《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同条事件引注说“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6]卷2《文帝纪》：77}。曹丕一即位，立刻离开了邺城，而五都的地位显然不可与曹操时代同日而语，这是邺城政治地位的下降。《三国志·魏书》又记载“（曹丕）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6]卷25《辛毗传》：696}，联系史料可知，这也就是迁出“任质”制度实施时，落户在邺城的居民，虽然最终没有完全实现计划，但是也反映出邺城经济实力的下降。北齐灭亡后，周武帝下令拆毁北齐宫殿园苑等建筑，邺城城市建设大不如前。《隋书·梁彦光传》记载“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禾户之家移实州廓”^{[22]卷73《循吏传》：1675}。邺城大量人口被强制迁走且迁走的多是上流社会成员，此后城市的状况不难想象。邺城一瞬间的灭亡，掩盖了它本应该存在的较为长久的衰落期。从深层次上讲，在冀南中心城市的又一次转移中，一样存在着这样类似东汉邯郸的原因。

两次转移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是仍然有同一性隐藏在其中，而所谓转移，实际上就是一城衰落，同区域内另一城随之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冀南中心城市的转移有三个共性原因：

第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兴亡周期律。如上文所言，冀南城市在战乱中繁盛，在和平环境渐趋衰落。冀南城市的一次次崛起与衰落，从外部条件看，是中国古代历史一治一乱相互更迭的宏观历史环境造成的。

第二，冀南的特殊地理环境。冀南西有太行山，有若干孔道与上党相连，提供了战略后方；南隔黄河远望中原，既可控制中原，又能对南防御；北部河网密布，形成若干天然城壕，几经修筑后，又形成了完整的水运网络。这使得冀南具有华北地区一般特点的同时，又有平原上难得的自然屏障。其特殊优势虽然不能充分发挥在和平时期，却适合战乱割据。这是外部政治环境所以能导致城市兴衰所凭

借的内因。

第三,冀南的交通条件及其变化。冀南一直是华北的交通咽喉,自春秋开始,经历了以邯郸为中心的太行山东麓陆路交通体系,以邺城为中心的水路结合的交通体系,和以大名为中心的大运河交通体系三个阶段。交通条件的变化造成了原有中心城市的两次衰落和新兴城市的两次崛起。这一点放大了王朝兴衰、政权更迭对冀南城市的影响。

三、古代冀南中心城市的地位与兴衰

探讨冀南中心城市的转移,重点是探讨冀南中心城市的衰落,而其衰落与其特殊而尴尬的地位密切相关,这是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一系列原因综合作用于上层建筑而产生的后果。

这种尴尬首先是其特殊地位招致的仇视。邯郸和邺城都遭受过毁城的惨剧,这两次浩劫都是由占据冀南城市的集团据之反叛而引发的。历代反叛中央的事件不胜枚举,毁城却不是必然结果,对于冀南城市而言,它们所以被毁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曾经作为敌对政权的首都存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论述了杨坚兴建大兴城的原因,指出原先的长安城内“充满了被杀害者的幽灵,也勾起人们对连续的政治失败的回忆”^[23],杨坚另建新都就是想要避开这样的环境,这也就不难让我们类比地理解中央政权对冀南城市的敌意——不论占据城市反叛的集团与原先的政权是什么关系,在统治者心中似乎总是能若有若无地感觉到先前敌人的幽灵。帝国“隳名城,杀豪杰”^{[1]卷6《秦始皇本纪》:281},名城邯郸自然是其中重点,也为章邯毁城埋下伏笔。北周灭亡北齐后,周武帝“诏曰‘(邺城)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并可毁撤’”^{[15]卷6《武帝纪下》:101}。毁东山、南园确实是要戒奢从简,但是毁掉重要的军事设施三台,就明显带有永久性解除邺城武装的意图。宋、辽对峙中,直到辽亡,也未能攻陷大名,这就使得另外两城的共性没有机会在大名身上表现出来。但是从后晋时契丹南下中原掳掠和北宋与辽的激烈军事斗争中,还是可以想见契丹对大名的态度。

冀南中心城市确实有其优越条件,刺激着占据邺城的集团谋求超越地区政治地位的野心,但是,当这一集团要在统一政权中面对整个帝国的实力,或是在两个政权的对峙中力图消灭对方时,冀南的条件又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冀南中心城市总是面临着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这与中央政权的敌意互为因果、相互作用,最终构成了对冀南中心城市的仇视心态。

仇视之外,冀南中心城市的尴尬又表现为特殊地位带来的歧视。通盘考察冀南城市的易手会发现,多数情况下冀南城市是在地方性政治集团之间争夺。邺城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这里围绕邺城再举出几则史料,说明这种情况。

(1)(自邺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6]卷6《袁绍传》:192}。

(2)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而制天下^{[11]卷123《慕容垂载记》:3081}。

(3)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邺,请迁都^{[24]卷2《神武帝纪下》:16}。

这三段话分别出自沮授、慕容垂、高欢之口,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对邺城的向往态度。在如后赵、后燕这样的占据河北、山东的地方性政权看来,以邺城为代表的冀南城市是他们理想的统治中心,甚至夺取邺城是他们最为重要的政治目的。然而,这些史料中又传递着另外一层意思。无论慕容垂、高欢还是上文中的曹操集团、拓跋集团,他们的态度都有意无意地将邺城和洛阳进行比较,而沮授更是认为占据邺城是为了返回伊洛。这里实际上就体现出了他们在向往之外对邺城的另一种态度:邺城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控驭地方而非驾驭全国的城市。另一组史料更为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态度。

《魏书·高闾传》记载“迁都洛阳,闾表谏,言迁有十损,必不获已,请迁于邺,高祖颇嫌之”^{[10]卷54《高闾传》:1207}。

《太平御览》记太和十八年孝文帝经过邺城时,崔光提出迁都邺城,孝文帝则认为“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坡,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25]卷161《州郡部七》}。

北魏两代颇有作为的皇帝对邺城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最终形成的对待邺城的态度,都是带有明显的歧视。联系邯郸和大名来看。秦汉帝国手中掌握着关中洛阳,在统一帝国内部,自然不会给邯郸太高的地位,尤其不会有太高的政治地位;大名曾在后唐和伪齐政权之初成为首都,但是,在同光三年,即是后唐建都邺城仅仅两年后,李存勖迁都洛阳,伪齐也是“寻,迁汴,亦伪称(大名)北都”^{[17]卷6《建元志》:214},这又可以看出另外两城所遭受的歧视。

综合来看,冀南中心城市在其发展史上几乎始终面临着全国范围内其他城市的竞争,一一数来,

安阳、咸阳、长安、洛阳、开封等等,几乎涵盖了半数华夏古都,而恰恰冀南中心城市又总是逊于这些城市。结果要么政治中心在一国内部转移,如曹魏、后唐、伪齐迁都;要么以冀南城市为中心的政权亡于外敌,如赵国、前燕、北齐灭亡;要么一个政权兴起于别处,与冀南地区无直接冲突,而以冀南城市为地区中心或陪都,如西汉邯郸、北宋大名。而中央政权看待冀南城市的眼光,要么是仇视,要么是歧视。仇视是视冀南中心城市为敌人故都,歧视是视其在长安洛阳之类的城市面前永远低人一等。冀南中心城市尴尬的地位是各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综合性的因素,在冀南中心城市的衰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笔者初步勾勒出了冀南中心城市兴衰历史规律的大致轮廓。冀南中心城市在中国古代的跌宕命运最终是以悲剧收场的。在这段历史中,有很多问题发人深思,而冀南中心城市留在中国历史上的痕迹也等待着后人的进一步发掘。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杨肇基.等.邯郸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 [3]陈光唐.赵都邯郸城的布局和兴衰变化[J].邯郸师专学报.1999(2):10.
- [4]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顾炎武.历代宅京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327.
- [9]乔登云.试论邯郸古城的历史变迁[J].邯郸师专学报.2010,20(6):28.
- [10]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江大键.彰德府志[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
- [14]酆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5]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 [16]张昭芹.等.大名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 [1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8]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9]司马光.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0]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2]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3]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1.
- [24]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25]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 陶爱新]

Discussion on the two changes of key city in ancient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WANG Yun-jiang¹, ZHAO Yue², Qi Meng²

(1.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Learned Journal,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there emerged many important cities in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in different periods such as Handan, Yecheng and Daming. Most of them later developed into key cities in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and even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Two changes of key city in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respectively occurred in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late Northern Zhou Dynasty. The first one is from Handan to Yecheng, and the second one is from Yecheng to Daming. This social phenomenon resulted from the macro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that period,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of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and land transportation.

Key words: Handan; Yecheng; Daming; key city